

中学校长的一句“最好的素质”，不仅道出目前中国素质教育的困境，也道出校长实名推荐制面临的问题。

校长推荐制推行两年，一直在争议中前行，但争议的焦点已经由当初的“校长推荐会不会导致腐败”，变成现在的“校长推荐成了分数大比拼”。2009年，北大首批39所校长推荐制学校共推荐了90名优秀学生，但大多数中学校长都选择了“锦上添花”地将推荐名额分配给成绩顶尖的优等生。有媒体对该年度校长推荐语盘点后发现，有60人的推荐语使用了“成绩优异”、“名列前茅”、“分数在年级排名前三”等字眼。

实名推荐成了实名“推尖”，鞭子不能全打在校长身上。据了解，校长实名推荐虽没严格规定，但“综合素质优秀或学科特长突出”却是基本要求。更何况被推荐者即使享受加分优

2010年度的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出炉了，前十名里，以青少年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占了半壁江山：杨红樱、郭敬明、郑渊洁、韩寒和天下霸唱。如此看来，说“中国作家爱吃青春饭”，多少是有点根据的。

这份作家富豪榜的公布也折射出当前出版界的现状。首先是阅读人口的年轻化。谁是中国大众图书市场的主力？毫无疑问是青少年，尤其是在校学生。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近几年的国民阅读率调查都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以旺盛的求知欲和日益增强的购买力，造就了青少年读物市场。相反，据调查，中国成年人年均阅读图书不到两本，与发达国家大多在10本以上、以色列甚至高达64本的阅读量相比，实在悬殊。其次，中国阅读市场存在娱乐化、功利化倾向。排行榜前十名作家中，没有一位是严肃文学作家；青春文学、玄幻小说、职场攻略最受追捧。在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这样的市场选择难对错。但问题是，对青少年而言，如果他们的青春都是在低幼化、浅阅读中度过的，未免太可惜了。一旦走出青春阅读的气场，读书的习惯就会在生活的压力下渐渐消失。而中国出版界的问题还表现在富豪作家们的“低含金量”上。和国外的同行比起来，就算是挤上了富豪榜的这些中国作家，其实也相形见绌。这恐怕有一个重要原因：创作理念和水准欠佳。

摘自《人民日报》11月16日 张贺文

## 胶州路大火不能只烧痛了上海

11月15日，胶州路一场大火，烧痛了上海。初步查明，这是一起责任事故，是由无证电焊工违章操作引起的。

高层建筑火灾是个老大难问题，或许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呈现出来。现在，消防实力最强的北京，也只能扑灭100米左右高层建筑的火灾。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既然如此薄弱，为什么当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却要一再修建超高层建筑，不断地把城市天际线向高空拓展？上海大火应该令这些城市的管理者和高层建筑的投资者们冷静下来，并令这股风潮得到有效遏制。

相信很多人面对这场火灾的时候，既会为同胞生命的逝去而痛心不已，也会产生对自身安全的焦虑。

高层建筑重在火灾的防患于未然，因此高层建筑本身的安全设施和防火能力需要更高的标准。近年来高层楼宇发生的火灾背后几乎全部隐藏着人祸。因而，有关部门需要做的是让高层建筑的消防设施不要成为摆设，让消防安全意识和制度贯彻进每一个社会环节，让消防演习不要走过场。

在这场上海大火中，如果项目施工和监理的安全防范措施都完全到位，那么，四位无证电焊工怎会上岗，火灾可能就不会发生；如果，这所居民楼的消防设施完全达标，或者在大楼中部有应急避难所，那么，伤亡可能不会如此惨重。更值得追问的是，据媒体报道，失火居民楼的业主曾经投诉施工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这有没有引起有关消防部门的重视？既然，四位电焊工根本没有证，那么，这个工程又是如何获得消防部门的允许而开工的？一个本是造福于民的市政工程，变成了一场祸害生命的灾难。事情何以会变成这样？期待这场大火背后的更多细节披露出来。

上海大火不能只是烧痛了上海，也应该烧痛很多国人。上海大火的善后不只是抚慰幸存者与罹难者亲属，以及公布真相、启动问责，在此之外，还要看到大火带给整个社会的心理震撼，要有切实的反思与改进举措才能缓解社会的焦虑。

摘自《新京报》11月17日

## 清华火灾烧出监管之失

11月13日凌晨1点多，清华学堂失火。300多名消防官兵耗时两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大楼东部部分屋顶被烧塌，过火面积达800平方米，幸未造成人员伤亡。清华大学称大火未对清华学堂主体结构造成影响。

11月8日，北京市文物局召开“全市文物系统冬春季火灾防控及2011年度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会议”，重点提到了文物修缮施工现场的安全问题。话音甫落，大火燃起，这真是充满讽刺意味。强调火灾防控，颇有必要，但仅仅强调显然不够。须知，台上阔论高谈，不如实地查看。与此同时还需叩问，无论清华校方还是相关施工方，是否将火灾防控镌刻在脑海深处？如果平时主动防范，这场无妄之灾或可避免。报道中还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几天前，一辆消防车在清华学堂前举行消防演习，这当然是必需的。问题是，演习过后，实际工作是否还是应付，还是演戏？

鉴于清华学堂的火灾，北京市文物局已印发紧急通知，再次强调火灾防控工作，特别是修缮工地火灾防控。既有前车之鉴，就该力戒形式主义，做到发文与督察并重，强调与监管共举。

摘自《京华时报》11月15日 王石川文

## 校长实名推荐变成了实名“推尖”

惠，北大对他们的综合成绩要求也是相当高。对于好不容易争取来推荐名额的中学校长来说，如果推荐了偏才怪才，不仅难以服众，还很可能因为学生成绩不达标而浪费掉学校的推荐名额。不仅如此，据媒体报道，北大遴选校长实名推荐学校的标准，除了有申请中学的办学条件、生源质量，考生成绩和申请学校每年考入北大的学生数量更是重要指标。而且，北大对各学校输送的生源还要进行评估，如果推荐的学生好，以后的推荐名额可能会增加；否则，不仅学生会被“退货”，下一年的推荐权也可能被拿掉。

不难看出，虽然校长推荐制看似教育改革的新事物，不少

人甚至将其解读为偏才、怪才的一大福音，但这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近日，北京大学公布了获得2011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资格的学校，由今年的13个省份39所学校扩展至全国161所中学。但查看一下名单不难发现，这些学校多数是各省的重点中学和升学大户，农村、边远落后地区的学校根本就沾不上边。

有舆论“夸赞”北大不断扩容但又不给出具体选才标准的校长推荐制，是一种变相抢生源的“高明之举”。事实上，这种让校长不敢推荐怪才、偏才，将全部指标都用在最顶尖、让人信服的学生身上的推荐制度，或许不是北大的本意，但却有意无意间引发了新一轮的高校“掐尖”争夺战。这不仅干扰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的推进，也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与培养。

摘自《中国青年报》11月19日 刘道彩文

## 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折射出版现状



## 批判现实主义的新气象

友人请客，到国家大剧院潜入“蛋壳”见世面，看了一场“主旋律”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故事挺“尖锐”，剧名取自《国际歌》的副歌：c'est la lutte finale，毫不回避“社会基本矛盾”。一高干家庭，老爷子不知受过什么刺激，常有幻觉，动辄回到革命战争年代，冲呀杀呀，要把名字刻在烈士墓上。家人遵循医生嘱咐，在他面前绝对不可提及任何涉及党和政府、改革开放的事儿，例如老二喜欢发牢骚，嘀咕些讽刺干部作风的笑话段子，老爷子听见，准犯保病。可是除了老两口儿，周围一帮人全在进步，上上下下，拼了命捞钱捞人。我边看边胡思乱想：有朝一日，会不会这伙硕鼠建成一国，“团结起来到明天”，他们依法腐败的那一万条“理由”，不就是一门精深的“国家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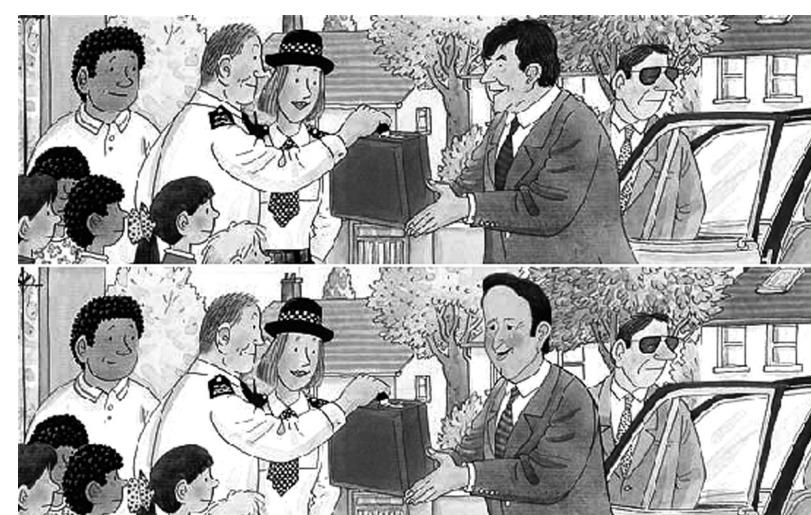
《斗》剧却在这一点上出了格：不但描绘了精英染的腐败勾当，而且推翻成见，把被剥夺的理性还给了替“理性们”打工、进城扛活的乡下人。是的，连上班吊儿郎当、被国企老总（老三）炒了鱿

鱼的那个农民工小伙儿，也晓得算计，运用理性编造理由。表面上对老板低声下气，暗地里却在给他的对头当“间谍”，查他挪用公款的黑账。这个猥琐的灵魂把农村人的好品德丢个一干二净，看到老板贪污案发，企图潜逃美国，就乘机上门敲诈，甚至图谋老板父亲即革命老干部的房产；恨不得老爷子老奶奶一伸腿送去八宝山，儿子女儿一总“双规”蹲大狱——好一名手狠心毒、玩得转法治的农民工！

如此，《斗》剧虽是“主旋律”文艺，却一反春晚式的逗乐和插科打诨，回归了严肃的现实主义，让观众直面那标举“理性”的法治化的社会腐败。

也许，这批判的现实主义，预示着一番新的气象，仿佛暴风雨到来前，一只迎着乌云低飞的燕子。现实主义文艺在现代中国曾有辉煌的成就；其勃兴于晚清，才俊辈出，至上世纪下半叶，方见凋零。今天，当旧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控制策略以“理性”的面目再临九州，可否期待现实主义更新我们的文艺，进而“让思想冲破牢笼”。

摘自《书屋》第11期 冯象文



## 牛津读物中的“首相更替”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1月13日报道，自从离开唐宁街的那一刻，英国前首相布郎就开始了“被遗忘”的历程。如今，他的身影更是从儿童读物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一个以他为主角的小故事都换成由继任者卡梅伦演绎。

这是牛津系列读物中一个名为“重要公文包”的故事，讲的是布朗曾把一个公文包遗落在灌木丛里，后来一群孩子拾到它并送到了警察局。最后，失物复得的布朗从座驾里走出来，亲自向孩子们表达谢意。然而，随着首相的更替，“与时俱进”的作者竟然用人气颇高的卡梅伦取代黯然失色的布朗作为故事的主角，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摘自中国日报网 王菁文

从本质上来说，网络流行语的大量出现，是因为在其某种程度上成为民意表达的符号。互联网成为人们表达意见、实现社会参与的重要空间。

网络流行语大量涌现，不仅描绘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利焦虑”，而且流露出网民对公权滥用的质疑和讽刺以及对不公平公共利益真相的渴求，应引起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高度重视。政府部门不仅应从网络流行语中倾听民意、体察民情，接受老百姓的监督，而且更应根据网络流行语所表达的民声，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化解社会矛盾。

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网络流行语已经脱离了单纯恶

搞的范畴，而有赖于热门新闻事件催生。网络流行语不经意间的蜕变，无疑使之具有了更加丰富、更加令人深思的内涵。看似无厘头带有戏谑性的话，投射出网友对公权力的不信任，也蕴涵着对更多事实的渴求。网络流行语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空间，同时还起到了宣泄不良情绪的作用。

2009年，“围脖”作为网络流行词汇之一，引发了一场微博热潮。微博使用者省去了遣词造句和缜密构思逻辑的

## 网络流行语折射公众的权利焦虑

广州亚运会新增了6个项目，其中好几个都具有鲜明的亚洲文化特色，如龙舟、围棋等；而卡巴迪、藤球这些运动则更是正宗的“亚洲风味”。

长久以来，在体坛上“种族体质论”都占着绝对优势，似乎亚洲人就注定以及天生和速度、力量型项目无缘，黄种人只能在侧重技能的竞技项目上实现抱负。广州亚运会如此钟爱亚洲项目，似乎也为这一认识提供了证据。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崛起之前，乒坛一直是欧洲人的天地；在威廉姆斯姐妹一统乒坛的前后，白人仍是乒坛的主流；自约翰逊之后，整个乒坛已经被黑人霸占了整整100年，但进入21世纪后，白人又开始重掌乒坛帅印……体育场上的肤色轮换已经几度春秋。

对体育比赛来说，比“种族体质论”更靠谱的解释是国家力量、社会文化习惯和经济基础。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当中国代表团穿着印有鲜明Logo的“李宁牌”运动服出现在开幕式上时，身边全是铺天盖地的耐克、阿迪达斯等欧美品牌，这是李宁第一次赞助世界级赛事；现在我们看见“撑杆跳女皇”伊辛巴耶娃、牙买加短跑名将鲍威尔、NBA明星艾文·特纳、“标枪王子”托希尔德森等各种肤色的顶级运动员穿着“李宁牌”出现在各大国际级比赛场时，已经不再觉得惊讶。

国家和文化的力量，在赛场上越来越跨越肤色、跨越国界。现代体育想要获得更为长久的活力，从人种上找动力和原因都显然不是正途。正如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提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基因”对于人类的意义非凡一样，众多“民族体育基因”里蕴藏着无穷的动力。如果把现在流行的运动项目定义为体育界的“主流文化”的话，那么，充满地域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则是体育界的“亚文化”——这些体育文化才是现代体育想要获得更为长久的活力的丰沃土壤。

摘自《新知客》第11期

## 日本文学奖是这样选出来的

在日本，最受关注的是芥川龙之介文学奖。读者想要了解芥川龙之介文学奖产生的过程不难，每位评委的详细意见都登在杂志上。

杂志首先公布评委阵容。以第141届芥川龙之介奖评选为例，评委包括池泽夏树、石原慎太郎、小川洋子、川上弘美、黑井千次、高树伸子、宫本辉、村上龙、山田咏美共9人。多为实力派作家或评论家，知名度也都不低。《文艺春秋》记录了评选的两小时内评委们的详细意见，并以每人千字左右的篇幅，加以整理公开。这样一来，读者就能了解（顺带监督）大奖产生的过程。评委的个人意见也可以自由发表，万一评委“民主”表决出一部引起公愤的劣作，先前反对的评委就不用背黑锅了。

有了记录，我们不解每位评委的看法，大家的意见分歧也是明显的。最后小说因得票最高而获奖，持反对意见的评委也会接受这一结果，毕竟自己要说的话都已经说了。这种评委间的争论在今年初的芥川奖评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有些评委强力推荐的作品“没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只好坦言遗憾。石原慎太郎则毫不客气地大骂其中3部作品（一共也就5部小说候选），因为它们的标题是片假名，有外语的味道，石原因此而忧心忡忡。

摘自《南方周末》11月11日 吉井忍文

## 金钱不能为历史伤疤美容

上周，据说是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商人，在英国花5000多万英镑拍下一个估价约80万英镑的乾隆时期瓷瓶，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价的新纪录。英国卖主激动得“几乎晕倒”，英国媒体纷纷感慨中国富人的“瓷器爱国主义”，《金融时报》称中国人在“重寻身份和文化”。

西方国家对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一直很警惕，但对这类“爱国主义”却十分欣赏。据称正是这种“爱国”感情的推动，近几年海外的中国文物价格“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如被专家认为并没太大文物价值的圆明园兽首被炒到亿元天价。

然而第一，这样的爱国并非理性的。事实上它是在促成西方老牌殖民国对中国的“二次掠夺”，上一次直接抢走了文物，这一次通过把文物卖给中国人，使当年的抢掠获得了经济上的套现，“赃物”还因此合法化。中国今后追讨文物将更加艰难，因为过去文物只是文物，现在文物成了潜在的巨额现金。让中国文物持有者放弃经济利益，比在道德上说服他们显然会更加艰难。

第二不能排除回购文物中一些与爱国主义无关的理性，这种理性是商业性的，其中含有相当复杂的国外及国内文物市场相互带动的谋算。然而

中国文物被炒热对我们的保护行动并不有利，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加剧中国国内的盗墓及向境外的走私。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目前在47国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167万件中国文物。而散落在海外民间的中国文物超过千万。这决定了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让所有流失文物回家，我们尤其不可能用钱把它们买回来。

其实文物对历史的记录是多角度的，除了单个文物自身的记录，中国文物在世界上的分布，也是对历史的诉说。这种分布记录了中国曾经有过的将近百年的被侵略史，以及那期间我们在文化上被人撕碎、蹂躏的悲惨境遇。那段历史是不可能通过回购文物抹掉的。

我们有必要对外追讨文物，但它原则上应当是无偿的。文物是被无偿抢去的，能用金钱买回的只是文物的外壳，买不回文物承载的大历史以及人间的正义。将文物货币化的过程，是以可以将历史货币化的轻佻和妄自尊大。

中国曾经在历史上受过伤，我们用不着花钱为那个伤疤美容。有几千年的文明的中国就是伤痕累累的，这些伤痕参与构建了中华文明的尊严和冷静，所以还是让金钱尽量远离对文物的追讨吧，金钱不大可能成为中国重塑文化精神的材料。

摘自《环球时报》11月15日

## 梁从诫：60岁开始的辉煌

应该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思考中国的环保问题。

“人一生会有一个高峰，而梁从诫先生的高峰，却是从他60岁以后开始的”，与梁从诫一起创办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现任“自然之友”理事长的杨东平说，“梁从诫对于‘自然之友’的开创之功，对于中国环保事业的贡献，恐怕他自己都想不到，他以感召带动和孵化了中国一代的环保人，如奚志农、杨欣等，这一代人的崛起，对中国环保事业的推动远远超出他个人的影响。”

纵观梁从诫的一生，熟悉他的人，包括他的子女，都同意，他的最后十几年，也就是从60岁以后的人生，是他最耀眼的一段。这里不应该拿世俗的成败来衡量，因为从环保事业来说，很难说其在中国有了很大成功。但是不

管环保事业发展得是否顺利，梁从诫完全是从自己做起的。他出门自备碗筷，生活尽量避免浪费，他家的洗澡水都是接在盆里再用来擦洗厕所的。他出行尽量骑自行车，连去参加政协会议也不例外，以致被门卫挡在门外，直到2006年他73岁那年，骑车被人撞倒，腿被撞断。从此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直至不能自理。

外人来看梁从诫，总不免爱以名门之后的大家子弟来打量他，而梁从诫一直希望以自己之力，只做“梁从诫”而不是谁之子。如果说到底层的背负与名门的教养，那给他的就是中国士大夫式的做人的自持自律，一切自然而坦荡纯正，毫无通融耍滑。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41期 黄艾禾文

“繁文缛节”，140个字符随意表达最想沟通交流的话，手机发布的加入让信息传递更及时，许多公众人物也都积极参与其中。而这背后还隐含着互联网时代深入人心的大趋势，每个人都有表达和沟通的欲望，字数的恰当限制让作家、评论家和普通百姓有了同等的发言权和表达空间，互联网草根文化进一步发展壮大。

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将会进一步加大公众的话语权。业内人士表示，很大程度上，网络热词也是“社会热词”。网络热词背后都有故事，对于网络流行语所折射出的舆情，亟待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摘自《法制日报》11月18日 杜晓、郑小琼文

## 法国没落了吗

今天发生了什么？昨日如此强大和富裕的法国消失了。法国人的自我感觉正从一流转变为二流或三流。在所有问题背后，可以肯定一切的不足来源于我们自身对过去和未来的看法。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以自己的历史而